

解 放 军 将 领 传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1984 · 北 京

解放军将领传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8·字数300千字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00

书号：11185·12 定价：2.40元

目 录

方志敏	(3)
韦拔群	(53)
左 权	(93)
冯白驹	(123)
朱 瑞	(149)
朱 德	(177)
许光达	(267)
刘志丹	(295)
杨 勇	(335)
旷继勋	(367)
张际春	(389)
周逸群	(407)
项 英	(445)
徐海东	(471)
曾中生	(509)
滕代远	(543)



万 志 敏

方 志 敏

—

方志敏(1900—1935)，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字志敏。江西省弋阳县九区漆工镇湖塘村人。一九〇〇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劳动农民的家庭里。

方志敏的祖父叫方长庚，生有七男二女。方志敏的父亲方高翥排行第三，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方志敏在家是老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按宗族家规，只有老大的长子才能入学，但因方志敏从小异常聪明，颇具天资，深得祖父喜爱，并受到村塾老先生的器重，因此破例让他入馆就学。这样，从七岁起，方志敏在家乡私塾断断续续读了四五年书。随着祖父病故，叔伯分家，方志敏家里生活每况愈下，到十二岁那年，他不得不停学务农，亲身体验到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这使他对贫苦农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一九一六年秋，方志敏在村里祠堂的竭力保举下，进

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入学不久，他便因成绩优异、能写会说、敢做敢为而深受同学们的爱戴。他很快就将弋阳九区十几个进步同学团结在自己周围，如：邵式平、黄镇中、邹琦、彭皋等。他们虽然名为小学生，实际都已是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在当时反封建、要民主、提倡民权新潮流的思想影响下，方志敏常和同学们一起议论各种救国之道，探讨如何解决比比皆是的黑暗现象。在方志敏的倡议下，一九一七年成立了“九区青年社”，确定了“抱不平、均贫富”的宗旨，他们团结弋阳的进步学生，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一九一八年，全国各地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进一步投靠日本的爱国浪潮也冲击到弋阳，极大地触发了方志敏的爱国激情，他写下了“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誓言，公开把它贴到学校布告栏上，还鼓动同学们一致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定。在方志敏和青年社骨干的带领下，同学们上街游行、讲演，张贴标语，查禁日货，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如：他们反对漆工镇的大恶霸地主黄理卿竞选参议员；向省警察厅控告镇警察所包揽诉讼、贪赃枉法的罪行；把一些恶霸地主的劣迹公诸于世。这些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也遭到豪绅大户的激烈反对和打击。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青年社内部分化，不少人退了社。从挫折中方志敏逐渐认识到：不联合贫苦工人农民，只靠青年学生是不行的。于是，他在家乡发展了一些进步农民加

入九区青年社，使青年社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到一九一九年，正式改名为“弋阳革命青年社”。青年社的建立和活动，成为党领导下的江西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社的成员很多都成为以后赣东北革命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人。该社还出有《寸铁》旬刊。刊名是方志敏起的，意思是同敌人作斗争光有文没有武是不够的，那怕只有一寸铁，也是战斗的武器。

一九一九年秋，方志敏从弋阳高小毕业后，抱着“学习工业知识，为发达祖国工业尽一片赤子之心”的志愿，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并很快被选为“甲工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甲工在省教育厅亲日派分子的把持下，充满了腐败的情景。现实很快击破了方志敏走“工业救国”道路的期望。为了改革现状，方志敏带领同学们调查揭露校方的种种弊端，发起驱逐校长赵宝鸿的运动，一时惊动了整个南昌城。当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已席卷了江西，方志敏参加了南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并经南昌二中袁孟冰和黄道介绍加入了由进步青年学生组成、以“将黑暗的旧江西改造为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的“江西改造社”，并参与编辑《新江西》社刊。这个社后来就成为方志敏从上海肩负党的任务回江西开辟革命工作的一个最初阵地。

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启示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方志敏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设法弄到英文版的《资

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为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认真研究这两本书，一九二一年夏，他考进了美国教会主办的九江南伟烈大学(即同文书院)。在校内，他常跟同学们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并联络校内外进步青年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方志敏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注意，不久，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就勒令南伟烈大学开除方志敏。这时，一位朋友从上海给方志敏寄来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方志敏看后非常拥护它的政治主张，并得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革命组织，就下决心要寻找它。期末，没等学校宣布开除，方志敏主动提出退学，并于一九二二年六月来到上海。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终于找到以卖报作掩护的共产党员赵醒侬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方志敏进入“上海大学”作旁听生。在那里，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蔡和森、邓中夏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都讲过课，使他直接领受了党的教育和影响。不久，在赵醒侬介绍下，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道路。

二

一九二二年八月，方志敏受组织的委派，离开上海回到南昌着手开展江西的革命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过去与南昌教育、新闻等各界的交往和影响，不仅站住了脚，而

且很快团结了邵式平、汪群、邹努、冯任、肖国华等一批进步青年。十月，方志敏同他们一起在南昌百花洲三道桥东湖边创办了一家以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吸引和教育进步青年为目的“文化书社”，方志敏亲自担任了书社的经理。恰在这时，赵醒侬和袁玉冰先后受党的委派来到南昌，他们同方志敏一起，利用“文化书社”作掩护，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他们在“书社”办起了《青年声》周刊，并继续发行《新江西》季刊。他们经常请进步的青年和学生来“书社”开座谈会，从中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团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他们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二、三月间，又吸收各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团组织的后备军。同时还以青年团员为核心组织了“民权大同盟”，吸收社会各界有民主思想的人参加，开展了反对军阀蔡成勋（江西督军）、政客李廷玉（省长）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两个团体还办了《红灯》、《觉悟》等刊物。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方志敏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一九二三年三月，由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方志敏等人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和破坏。不久，新文化书社被查封，刚组建的社团被取缔，袁玉冰等被捕。方志敏因肺结核正在住院治疗而幸免遇难。按照党的指示，一九二三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方志敏化装

乘船离开了南昌，经过南京，第二次来到上海，并见到先期脱险抵沪的赵醒侬，继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阵线，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赵醒侬作为共产党江西省的代表，出席了国民党的“一大”。会后，他和邓鹤鸣一起，被派回南昌，负责领导江西的革命工作。在赵醒侬的要求下，一九二四年二月，党派方志敏也回到南昌。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他们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主持和开展国民党在江西的工作，二是建立共产党在江西的地方组织。方志敏协助赵醒侬首先把经过考验的邹努、肖国华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二月底，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江西直属支部，这是党在江西最早建立的正式组织。

当时，国民党在江西的组织，虽然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已成立，但由于国民党历来组织松散，又没有群众基础，除了有几名党员，一切工作几乎没有开展。为了真正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赵醒侬、方志敏、邓鹤鸣和曾天宇等人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帮助重建国民党在江西的组织。一九二四年三月，先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随后逐步建立了各地县、市党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为了培养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方志敏和曾天宇等遵照党的指示，在南昌办起了“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为党开展秘密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

护场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随着江西各项工作的开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党中央决定改江西支部为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以后又改称省委），以赵醒侬为书记，方志敏、曾天宇为主要领导成员。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南昌地方委员会也正式建立起来。由方志敏领导筹建的党的外围组织“江西青年学会”也正式成立，并且还创刊出版了《江西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赵醒侬、方志敏等的领导下，江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从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初，两党一起在全省发起和推动了“拥护孙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两次民众运动。由于运动搞得广泛深入，大大促进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使得这一时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商界和上层的运动都蓬勃开展，革命形势呈现出一派生机。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因势利导，立即指示各地，要尽快发展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各地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迅速开始组建党的支部。在建党过程中，方志敏针对一些青年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和轻视工农的偏向，亲自做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大家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到一九二六年秋天，赣东北各县的党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建立起来。在大好形势下，方志敏深感江西农民运动还远远不适应革命的要求，于是向赵醒侬提出下乡搞农运，省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负责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震撼全国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爆发。方志敏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任意屠杀无辜的人民，心中无比愤怒，立即参加了“江西沪案后援会”工作。当时方志敏的肺病发作，常常卧床不起，但他仍顽强工作，甚至接连几个晚上不睡觉。后援会派方志敏到赣东各县去工作，他经常深入到那些十分偏僻县份的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五年七月，在赵醒侬、方志敏的积极筹备下，秘密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选举，赵醒侬当选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方志敏、邓鹤鸣等七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曾天宇等被选为监察委员，同时正式任命方志敏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部长。

三

一九二五年夏天，方志敏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回到家乡弋阳。他首先发动以“弋阳革命青年社”为骨干的广大农民同当地的土豪劣绅作斗争，迫使他们交出了以“竞选议员”为名从贫苦农民身上敲诈所得的大笔经费，并用这钱开办了“旭光义务小学”，白天教儿童，晚上办“贫民夜校”。通过读书识字，方志敏向贫苦农民宣传了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培养了骨干，并在湖塘村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很快，弋阳九区和临近各区也陆续建立了农会组织。在此基础上，方志敏和方志纯一道，在漆工镇上建立起赣

东北农村的第一个党小组，发展了黄镇中、邹琦、彭年、祝炎和方远杰等农会骨干入党。到年底，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把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

这年秋天，弋阳遭旱灾歉收，方志敏决定通过农会发动农民向地主豪绅进行减免租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方志敏义不顾亲，率领农会会员在湖塘村斗倒了顽固坚持收租、一心与农会作对的亲五叔方高雨，迫使他向农会认罪，宣布免租免捐。减免租债的斗争震动了整个弋阳，更多的农民加入农会，使农运蓬勃兴起。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全省已有六个区、三十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农协会员一千一百余人。

一九二六年一月和五月，方志敏作为江西省的农民代表，两次到广州参加了广东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结识了农运领袖彭湃，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课。方志敏还同与会代表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又参观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处处得到鼓舞和收获。就在这时，他肺病复发，吐血加高烧，病情危急，不得不在上海和庐山牯岭住院治疗了几个月。

北伐军占领武汉并将进攻江西的消息，使方志敏不顾病体立即出院回到南昌，全力投入农民运动。他深入南昌、新建近郊，在“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广泛建立农会，领导农民为北伐军带路、送饭，抬担架、运粮草，使北伐军在各地农会支持下，迅

速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并于十一月初占领了南昌和九江。革命高潮推动了农运的发展，从十月到十一月，江西省农会会员的人数从六千迅速发展到了五万。

斗争形势大好，但方志敏从以往经验教训中深感掌握武装的重要，他及时指示各地农会注意收缴军阀溃兵的枪械，组织农民自卫武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正式成立，方志敏当选为筹备处委员长兼秘书长。会后，方志敏立即派邵式平、黄道等一批得力的人为特派员，分赴交通线各县去指导农运，很快就使全省上下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力的组织系统。在有利的形势下，弋阳九区的农民协会在方志敏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底举行了有名的漆工镇暴动。农民们猛烈冲击了土豪劣绅、占领了镇警察所，缴获了两条半枪（其中一条只有半截枪筒）。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蒋介石阴谋背叛革命，在南昌设立了反革命的总司令部。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北伐军总司令的职权，指派亲信段锡朋、李烈钧控制了江西省党政大权。尽管如此，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方志敏以重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业绩和威望，仍被推举为大会临时主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也继续当选为执委、监委。这时，蒋介石公然使用“圈定”的办法，把方志敏等非法排斥出省党部，并撤掉了方志敏的农民部长职务。由于蒋介石一时还不敢撤销

方志敏在省农协筹备处的职务，所以只是派了几个“委员”到省农协经常捣乱破坏。方志敏坚持对他们进行斗争，他曾对一些人说：“我们和反动分子的斗争，是要保证农运工作的开展。农运工作是我们进行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要使将来社会革命获得成功，现在就要在农村扎好根。”

二月二十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又出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方志敏没有理睬当时省委让农协妥协退让的训示，而是急电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请求指示。中央农委回复：“坚决反对‘圈定’办法，宁可大会开不成，也不可屈服。”于是，方志敏不顾敌人暗杀的威胁，带领各地代表，同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打掉了所谓“圈定”的办法，并揭穿了他们变相购买选票的伎俩，粉碎了国民党右派企图夺取农协领导权的阴谋。在激烈斗争中，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农协的常委和秘书长。

三月初，江西的国民党右派接连制造了镇压革命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流血事件。为了领导广大党员群众声讨蒋介石新军阀集团在江西干下的一系列罪行，方志敏借到武汉开会的机会，约集了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左派执委、监委和其他各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这一活动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在他们领导影响下的中央农讲所、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国民党两湖省党部、驻武汉部分军事机关、各